

名家视界 书库丛书



从

走出的。

教育家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在一
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
学习，在学习中品味、奋斗和超越。



刘国生◎主编



JIAOYUJIA
congqinghuazouchude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从
清
华

走出的教育家

刘国生 主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刘国生主编.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7, 12

(名家视界书库丛书: 4)

ISBN 978 - 7 - 80675 - 592 - 1

I. 从… II. 刘… III. 教育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516 号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刘国生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 - 8241422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莫日根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5 - 592 - 1/Z · 040

定价: 29.80 元

前言

一个个史学家在历史风云中的起落与沉浮；

一个个科学家在追求真理中的执着与奋争；

一个个文学家在艺术探求中的选择与爱恨；

一个个教育家理想抱负中的迷茫与清醒。

当一种文明以高贵的姿态来表达；当一种财富以精神为载体来呈现，我们对此除了怀着一种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外，还有一种对那些精神和文明创造者的崇高敬仰。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动机出发，在秉承学术成就和道德垂范的双重标准下，我们精心选取了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走出的科学、教育、文化、历史四大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他们多为学校的资深教授和中国院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大家”的传奇人生予以浓缩，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贡献及成长过程的同时，还着力铺叙他们所亲历的时代风云，以期借助他们的慧眼看历史之风云，观科技之发展，览艺术之璀璨，感教育之影响。将他们的风采整理成束予以集体亮相，无疑成全了广大读者对于精神巡游的期待。回望那些民族大义与人生命运的相互关联，启示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细心整理中，一个人文的脉络日渐清晰，我们发现，不同领域的“名家”却那么惊人地相似：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胸怀天下而波澜不惊。他们那么朴素真实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的研究似乎离生活很远，却引领着全民族、全人类的进步。长期以来的研

究与探索,早已让他们习惯了从容和淡定的生活。然而,在自我领域纵横驰骋的卓越成就,早已不顾他们个人的低调,将其彻底暴露。作为文明的标杆,他们让文化和精神近乎立体化,那么生动,那么具象——有着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书卷气,当然还有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后留给中国读书人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望其项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站起来的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名家视界书库丛书”不仅是讲述“名家”人生经历,展示精神风范的窗口,以反省个人与时代、科学与人文为重大主题,诠释人生的真谛,掘取文明的碎金,更成为广大读者精神食粮的仓储!不仅如此,穿插其间的大量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是将这些“名家”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复原,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索精神。

蜀地的盘山路九曲十折,就像历尽艰难的人文事业一样;而物质的丰裕、生活的安稳一定程度上消磨着一些年轻人探询的热情。对于记忆或许我们本不该太过苛求,但对于这些文化的“名家”,或许我们需要重提那句俗语:遗忘是可耻的!面对他们,面对历史,或许有责任做这样的自我叩问:时代给予如此多元的选择,生活赋予了我们以富足,我们给予了社会怎样的回馈,我们对于自我人生的价值又做了怎样的发挥?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还不确定,就让我们手不释卷走进北大清华,走近那些文化名家,让我们在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愉快的阅读中阐发经典的魅力。追随北大清华“名家”的光辉足迹,在人生的自我观照与顿悟中扶正自我、鞭策自我、超越自我。

易磊

目录



潘光旦	001
陈岱孙	018
吴有训	039
吴 宓	051
李继侗	077
陈 桢	086
吴韞珍	095
郑之蕃	099
杨廷宝	103
周诒春	111
萨本栋	124
梅贻琦	131
蒋南翔	154
冯友兰	180
吴柳生	193
夏 翔	199
陈士骅	210
陶葆楷	220

钟士模	228
李 欧	236
万邦儒	243
黄 自	250
夏培肃	257
雷海宗	265
浦江清	276
邵循正	287
张锡钧	295
王志均	300
谢毓元	310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cong qinghua zouchude jiaoyujia

潘光旦



潘光旦,我国现代杰出教育家、社会人类学家、性心理与优生学家,字仲昂,江苏宝山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先插入纽汉普夏(New Hampshire,今译新罕布什尔)州之达茂(Dartmouth)大学三年级读动物学;一年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先后在松江政治大学、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厦大、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开出《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曾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在社会学术活动方面,先后兼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书报春秋》主编,上海《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编辑;独立主编过《优生月刊》、《华年》(周刊)等刊物;发表过大量有关优生和家庭问题的文章,并出版过《优生概论》、《中国之家庭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专著。以优生学及家庭问题方面的研究蜚声中外。1934年,应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之聘,莅校任社会学系教授,不久即被聘为教务长,成为老清华最得力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到校初期,先开出《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史》等课,后又先后开出《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潘光旦是



最著名的“通才教育”学家之一。在清华任教期间先后著有《教育与位育》(1932)、《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论大学训导长》(1939)、《论二十七年度招生报告》(1939)、《再论宣传不是教育》(1940)、《大学一解》(1941,与梅贻琦合作)、《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1943,与梅贻琦合作)、《自由、民主与教育》(1944)、《说学人论政》(1944)、《政治信仰与教学自由》(1946)、《教育的更张》(1948)等。

通识少年

潘光旦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是校园内最有才华的通识少年之一。特别是升到高等科以后,他的学习面十分广博,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数、理、化、生物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文方面的国文、英文、历史等“公共课”外,还要选读一些诸如英文方面的《文学概论》、《莎士比亚集》、《英文小说集》;数学方面的《数学概论》、《高级数学》、《微积分》、《画法几何及器械画》;自然科学方面的《生物学》、《植物学》、《农学》、《农产学及牛乳学》、《化学一》、《化学二》、《物理学一》、《物理学二》、《测量》、《工场实习》;社会科学方面的《经济学》、《簿记及会计学》、《货币及银行学》、《商业组织》、《中国外交史》、《美国史》、《1815年后之世界史》、《政治学及远东政治》、《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现代文化》;哲学方面的《论理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方面的《第三年法文》、《第三年德文》、《科学德文》等等。而潘光旦所修的诸门课程,几乎门门优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校期间,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当中,都有不少人对“中文”课不重视。用潘光旦后来回忆时的话说:“老师对中国固有文化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课堂上的怪异场面”。所谓怪异场面,无非是逃课、打瞌睡、以至耍笑老师。潘光旦对此种现象甚为不满,一方面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加以批评,另一方面以身作则,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外还到图书馆广为涉猎。而且利用每年两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有计划地集中阅读。他说:“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而外,搞过七八个暑假,对国学和旧文献算是获得了一些知识,打下了底子”。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cong qinghua zouchude jiaoyujia

在美国留学期间,那里广泛实行“通才教育”。这正好符合潘光旦的要求。于是他如鱼得水,广为习求。他说:“譬如我吧,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甚至 Pipecourse(烟斗课,上课时师生叼着烟斗闲聊)也念。”又说:“美国大学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以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自己去钻图书馆,逛书库。我就用了这一条。”

潘光旦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爱好运动,一次运动当中不慎伤了腿,结核菌侵入伤处,造成悲剧,不得不把右腿锯掉,因而延误了毕业期。有一次,他问当时的代理校长、教育部官员严鹤龄:“我只有一条腿能不能出洋?”严回答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认为,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光旦听了很是沮丧,但不服气。但美籍图画女教师 star 却站出来为他说话,她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还有谁能出洋?”

潘光旦到了美国,先在达茂大学插班读三年级(当时清华毕业生到美国后,一般是插入二年级,能插入三年级已是很不错的了)。在达茂读了一学期之后,教务长给他写了封信说:“对不起,你应该读四年级”。他于是转入了四年级。

前已述及,他在此期间广涉博览,无所不学。逐渐,他又对《优生学》发生了兴趣。每年暑假,中国留学生一般经济宽裕者大都外出旅游,经济不宽裕者则要外出打工挣点儿钱以贴补学杂费。潘光旦则利用此时间进行《优生学》的学习与研究。1923年夏,他利用到美后第一个暑假到纽约长岛冷泉的《优生学》纪录馆参加优生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和第三个暑假,他又接连两次在这个记录馆参加《人类学》和《优生学》的研究工作;1925年,还同时在卡纳奇研究院参加《内分泌学》的暑期训练班;1926年夏,在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学习《单细胞生物学》。

师儒风范

1934年,潘光旦回到母校,受到全校上下以至京华学界的热烈欢迎。在校内,校刊报道说:“潘先生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社会学

从

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congqinghuazouchudejiaoyujia

教授、上海《华年》周刊及《中国评论周报》编辑,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著作甚多,如《中国之家庭问题》、《自然选择与中华民族性》、《人文生物学史》等”;又说:“新开科目,大致可开:一、社会思想史;二、家庭问题;三、《优生学》,俱由潘光旦先生担任。”在校外,北平妇女协会、女青年会等妇女团体多次请他讲演。师范大学组织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时,特意请他到会讲话。因为他讲演时多次讲到有关优生的问题,曾引起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听讲者的不理解或非难。有一次,他从青年会讲演回来,一位学生戏问他:“潘先生,今天挨骂了没有?”他笑了笑说:“今天很好,没有挨骂。其实,骂尽管她们骂,说我还是得说。只要我说的有道理,终归她们会信服的”。这位同学后来提起此事时感叹地说:“这句话实在是学者名言!”

潘光旦到校初期,先开出《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史》等课,后又先后开出《人才论》、《家庭演化》、《儒家之社会思想》等课。在教学方面,他十分不满于“近代以来师道的扫地”。他说,老师不以师表自居,成了和百工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种职业,在对学生的般生活照顾方面,连手工作坊师傅对徒弟都不如。因而他十分强调以身作则的人格教育。在教学法方面,他一贯反对“灌输”式,主张“自自动自求自得”的启发式。他主张“顺其自然,因其固有”;“不顺其自然是戕贼,不因其固有则徒然。”他在讲课中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喜欢同学发表意见,提出疑问和见解。他讲授的课程,每周都要安排一、二小时的讨论,让学生尽量发表意见,他总是面带笑容,细心听着,假如说得头头是道,便连声“是!是!”表示同意;如果有不合情理或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条理清晰地加以解释或讨论,直到大家满意为止。他认为这可以锻炼学生的口才和思维能力。课间休息时间,常见他和同学说东道西、讨论或辩论问题。在课外,他欢迎学生有了问题到他家去找他请教或讨论,不论是课程内的问题,还是课程外的如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无不欢迎。在他家,他接待学生十分热情,一位学生回忆说:“在他的书室里,你可以看到满屋是堆着的书籍杂志,其中大部分是家谱。倘若你心血来潮,要看看你过去祖宗的名气,他会很和悦地原原本本地搬出来指点给你看。话讨论完了,你要离开了,他又很和悦地送你到门口”。在讨论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民主和耐心,不急不躁,不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congqinghuazouchudejiaoyujia

温不火。有一次,在社会系的迎新会上,话头居然转到了他的牙齿上了:有一个节目是让大家提出一项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一个新同学竟然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光旦吸烟斗多年,满口牙齿已黄得发黑)。一时哄堂大笑,笑声持续很久而不能平静。最后潘先生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确实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紧接着又是一阵满足的笑声。

“中和位育”——教育思想的核心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潘光旦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教育学说和思想体系。就其源流讲,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也和当时以蔡元培、梅贻琦等先驱者为代表的许多杰出教育家的“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人格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的表述方面,则具有自己的一套独特(也可以说是更深刻)的见解而自成体系。用他常用的四个字来表达,可通称为“中和位育”。

“中和位育”四字源于我国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潘光旦曾在多种著述中,较详地解释过他的“中和位育”思想的真义。诸如: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学者下注解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做“位育”。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安所遂生,适与生物学家研究生态学(ecology)后所得之综合观念相吻合无间。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当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地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

△社会的位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位,即是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一方面是育,即是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



005



兼适当的“异”。“同”而过当,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异”而逾量,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状态。二者都是不相宜的。为社会秩序计,“同”非不可欲,然而不宜“尚”,中国史实早已昭示于我们了;为社会进步计,“异”当然可欲,然窃以为也不宜“尚”,“尚”则也不免有流弊。

1941年4月,潘光旦乘清华在昆明举行30周年校庆的机会,与梅贻琦校长合作撰发了《大学一解》一文,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中和位育”思想:

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之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事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根据他这一终生不渝的教育思想,他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论述,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年)、《再论宣传不是教育》(1940)、《大学一解》(1941年)、《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1943年)以及《论教育的更张》(1948年)……等篇。兹仅以这几篇文章为底本,以“中和位育”为主题,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学说,集中作些粗浅的解释。

一、健全人格

文明人类,无不由“己”与“群”两大方面构成。上面已经提到,他认为,由众中之“己”和众己所组成的“群”(或云个人和社会)两个互相依存而又各自独立的两大部分“相位相育、安所遂生”的关系,就是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在“己”与“群”的关系中,“己”是根本的、关键的东西。所以一切教育都必须从“己”开始。西方(古希腊)人生哲学讲“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中国儒家教育哲学讲“古之学者为己”,其道理也就在这里。而每个“己”(个人),都有其从长期生物演化史中演化出来的三种属性:“互同之通性(用以维持社会秩序),互异之个性(用以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男女之性别(用以繁衍后代)”。但“人性”不等于“人格”。一个人的独立、完整(或囫囵)的人格还包括“心理生活说到的志、情、意和从道德生活说到的智、仁、勇等方面。前者种种

可称之为“人格”之“经”，后者种种可称之为“人格”之“纬”。所谓“人格”，就是由这些“经纬”编织而成的完整(囫圇)的“人格”，而非人格中的某个片断。这里所说的“人格”，是指“格局”之格，而非“标准”、“模范”之格；衡量“人格”的唯一标准是看其完整不完整，而并非通常所指的“高尚不高尚”或“模范不模范”。

二、教育与教师

一切教育的唯一对象是人(即前面所说的己、个人，不是群体，更不是社会)；一切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每个个人的人格的教育和培养，以期完整(囫圇)人格的实现……。所以中国儒家教育哲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首先也是从“明德”(修己)开始。教育不是训练，不是一味地传授些现成的东西；教育不是宣传，不是宣传些没经历过事实与经验的盘诘的东西。技术学校、训练的机关、宗教和政党办的“教育事业”，也许有理由这样做，而一般的大、中、小学校这样做，就没有理由了。马戏班对各种动物，卖艺的乞丐对有几种虫子，包括虱子在内，要他们能作人行，能跪拜，能跳舞，以及弄各种把戏，更不得不这样做，但对人就不相宜了。……教育的原则一是使受教育者获得“自发、自动、自求、自得以至于自治、自制的能力”一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更多的“单独作战”的机会。目前(按指老清华时代)的青年在这方面的能力颇有不齐，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但谁也多少有一些，多的所需要的激发少些，少的所需要的多些，但谁都需要一些激发，这就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了。好学的青年往往拿这一点来衡量他的教师，认为教师的好坏，不系于口齿的伶俐、教材的多寡，而系于此种(激发)能力的大小。激发能力小的教师最多只能教他学习，学习些现成的东西；激发能力大的教师却能教他思考——而比较推陈出新的发现，一些旧看法的新结合，旧概念的新意义，以至于不轻信和积极批评的一般的态度与能力都从思想的习惯产生。好学的未有不深思的，而多少总有一些自发与自动能力的青年也未有不好学的，而深思的结果，对事理能有些新意义的发现，新结合的完成，便是他的“自得”了。这也是教育的最大收获。而“文化”者也，论其精髓，也无非是这一类“自得”的积累罢了。



三、教育的误区

教育不能“从外缘的社会入手以达于每一个人”，而必须是“从每一个人身上入手以周遍于社会”。有人把教育当作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的需要”、“社会团结是教育的基本功能”……等等，因而进入误区。因为这样的教育就恰好违反了上文所提出的一个原则：——必须以每个个人为目的，从每个个人的身上着手。……教育树人，不比工厂出货，不能先有一个模式、一套做法，然后“教原料就范”，产生同样的货品。“同样”不等于“共通”，健全的社会需要共通的人品，但“同样的货品”和“共通的人品”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要产生共通的人品还得以每一个人当目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用工夫，教的人须要如此，学的人尤其须要如此。教育一个人，就得把人性的经纬诸端都教育到了，否则，结果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结果是，个人全都成为畸形的人，零星片段的人；而于社会，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甚或由于权益的冲突，愈见得无法调和；领域、门户、阵线、壁垒之见愈见得无法消除。科学的知识越来越细致，政治的主张越来越偏狭而无法通融，固执而不能移动。“专家”与“自信负有使命的人”才越来越多，而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也就是，人与人，群与群的合作越不可能。“这便是常见的‘大时代’了”。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大凡迷信训练与宣传即为教育方法的人在见地上总有两种错误：一就是上文所已讨论过的只知为外援的需要设想，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想把人当作满足这需要的工具，而这外援的需要也者，名义上尽管说得很像是社会的，实际上可能是他自己的，和马戏班里的老板的用心没有多大的分别。……就接受之一方面而言，十之八九只是模仿，说轻了就是受人支配，说重了就是受人奴役。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四、教育的忏悔

潘光旦于抗日战争时期曾撰写《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一文，其中指

从清华走出的教育家

cong qinghua zouchude jiaoyujia

出,近代(按指当时,其实也包括现在)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作一个“人”,作一个“士”。他认为,近代中国教育实际上并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和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教育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叫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的“资格”,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论不议之列了。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这要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来衡量,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心灵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教育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当时每年毕业的数以几千计的大学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潘光旦认为,所谓“士”的教育可分为“理智的”和“情志的”两个方面:所谓理智的,就是要从道理上知道什么是“士”。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推十合一为士”。并解释说,读书人最怕也最不容易避免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二是“执一不化”。“泛滥无归”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执一不化”的人患在未曾“推十”,早就“合一”。(当然,不“推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合一”的。所谓“合一”,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所谓“情志的”,又可分为平时的和危难时的两个方面:在平时,要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情志;及处危难时期(例如当时所处的民族危难时期),要牢守“见危授命”,“可杀不可辱”的志节。必要时要以生命作一种理想的拥护者,因为这是“士”的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一只棋子。平时也好,危时也好,“士”的所有情志,都要靠平时的培养工夫。

实践“士”的教育,需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是立志,也就是“要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忠恕一贯的道理,忠就是笃



信,用近世流行的话讲,就是要有一个作人方面的轻易不肯放弃的立场;恕就是容忍,用近世的话讲,就是要了解和谅解别人的立场。……

人的青年时代(如大学本科时代)是进行士的教育的大好时机。别种教育,如识字教育、吃饭教育、文官教育、专家教育等等,误了时机,多少还可以补习或追习,唯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时期进行不可。因为青年人有四个心理特点:一是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和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是由此推演而出。不过他们也同时存在着一些弱点,一是流放,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渐灭。前三种危险在青年期以内便可以发生,后一种则大都在青年期以后。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虽因年龄期而大致相同,而其整个的品格的表现则往往因遗传的不同而有个别之异。这种差别,约而言之,又不出狂与狷二途。大率狂的易流于放浪,而狷的易趋于胶执。放浪之极,胶执之极,又一无成就,则易“暴气”,“暴气”而不能“持志”的结果,势必转趋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杀作“最后的归宿”的。所谓“流放”,一开始还不一定表现为漫无节制,举凡读书时代兴趣的泛滥无归,学科的东拉西扯,无选择,不细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骛远,不切事理,纷然杂陈,莫衷一是,都可以算作流放的表现。“胶执”的则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而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事理尽在于此,以为社会国家的彻底改革,非此不成。……这两种趋势,方向虽有不同,而结局则往往相似。至于第四种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渐灭,则往往在青年时期以后。我们时常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便而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求知欲很强烈、理想很丰富的会变成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会变做追名逐利,狗苟蝇营;家庭改革的健将会变做妻子的奴隶、儿女的马牛。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渐灭故。

“士”的教育的效用,就是要调节与维持这种青年的特性;调节,所以使不流放,不胶执;维持,所以使不消沉,不渐灭。讲博约,讲忠恕,讲推十合一,即所以调节流放与胶执两种相反的倾向,使不但因相